

評達第斯者「征服者與儒家——中國元末政治變遷」

胡其德

書名：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

作者： John W. Dardess

出版時地： Studies in Oriental Culture No. 9. Columbia Univ. August, 1971. Reprinted by Rainbow Bridge Book Co.

目次： Introduction, 6 Chapters, Epilogue, Conclusion, Biographical Notes, Table, Notes, Bibliography, Index.

一、前言

元朝的建立者蒙古人崛起朔漠，初無文化可言。洎窩闊台滅金，稍稍吸取一部分中原文化。世祖忽必烈滅了南宋之後，更擢用大批漢人爲其幕僚，奠定元朝之立國規模。但此時儒學勢力仍然很小，世祖重用的是能爲他聚斂的色目人，如阿合馬、桑哥等。一三二八年，文宗圖帖穆爾之即位，得力於儒生幫助，再加上當時元朝已蛻變成中國傳統式的王朝，不能不引儒學以治理天下，故自一三二八年後，儒學勃興，儒化運動如火如荼。其後，在伯顏當政時代（順帝元統元年到至元六年，西元一三三三年到一三四〇年），儒學雖一度遭受壓抑，但至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年）脫脫主政後，儒學遂成爲支配元朝的最高政治理念。其後，儒學分成兩派，互相傾軋，終於導致元亡。

達氏之書，即從時間上縱的關係，來探討儒家與儒學在元朝地位的發展，及其與征服者的關係，作者尤其側重於蒙古人和色目人方面，因爲作者認爲他們是儒家政治論爭中的主角。彼所謂「元末」，即以一三二八年爲斷限。

作者是因為要研究明太祖的政治性格與措施，才追本溯源，研究元末的政治變遷。他相信元末儒家政治論爭中的一些理念，對於了解明初的歷史是很有幫助的。

二、主要內容及見解

全書共有六章，若再加上前面的緒論，後面的尾語和結論，則一共有九個部分。緒論述其著作緣起及探討的範圍、方向和目的。

第一章 「西北諸汗國在元廷政治勢力之衰微」

此章是「從外在觀點，解釋蒙古帝國演變成中國傳統式王朝的最後過程。」在一三二八年以前，西北諸王尙可干涉元朝本部的內政、外交；對皇位繼承尙有發言權；雙方仍有政、經關係，但自一三二八年之後，西北諸王在元帝國本部完全喪失了勢力，無法再覬覦大汗之位。政治上的失意者也無法再以漠北爲捲土重來的根據地。故武宗（一三〇八—一三一—）和明宗（一三二九—一三三〇）雖然都從漠北回就皇位，但一則成功，一則失敗，其因即在於一三二八年後，元帝國的重心已在中國本部，而不在漠北了。此章並簡述了世祖與武宗的中央集權措施。

第二章 「一三二八年的政變」

此章是「以內部觀點，解釋蒙古帝國演成中國傳統式王朝的最後過程。」所謂一三二八年的政變，是指將皇位從晉王甘麻剌子孫手中，奪歸武宗子孫。此次政變，不但表示西北諸王從此無力干涉元朝政治，並牽涉到高階層官僚之大變動，奠定元朝儒化的基礎。

作者分析這次政變成功的主因，在於儒士與燕帖木兒、伯顏等海山黨充分合作。燕、伯二人並非儒學的支持者，照理不會

與儒士合作，但因有康里脫脫作爲媒介，且雙方都以打倒鐵木迭兒爲鵠的，故能完成大舉。康里脫脫、燕帖木兒、伯顏諸人，皆曾追隨海山汗（武宗）出征漠北，是海山黨的核心人物；康里脫脫與燕帖木兒同屬色目人；他本人又是儒學的積極贊助者，故他雖未能參與此次改變（他適於政變前一年去世），但燕、伯諸人受其影響，亦能暫與儒士合作。政變成功後，燕帖木兒操縱大權，曾應儒士要求，大殺鐵黨及回教官吏。但他們的合作究竟只是暫時的。一三三二年，文宗死後，他們就拆夥了。

第三章 「伯顏與反儒運動」

此章首先敘述伯顏的翊戴之功。作者強調當圖帖穆爾（文宗）從江陵北上角逐皇位時，伯顏正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爲文宗必經之地。由於伯顏護駕，使得文宗輕而易舉的登上皇位。因此，在文宗統治時代，伯顏的地位僅次於燕帖木兒。文宗死後，伯顏聯合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排除燕帖木兒及其戚族徒黨，故在順帝時代，伯顏的權力達於極點。

順帝即位時，只有十二歲，由伯顏及文宗后掌政，此期最主要的措施是廢除科舉。在這方面，作者綜合了前人的說法，並提出自己的見解：伯顏之反儒，只是爲了現實的目的，而並非在觀念上反儒。他並非要毀滅儒學，因爲他也主張輕徭薄賦，保護孔廟。伯顏只是要滅弱儒家在中央政府的影響力，並恢復以前各階層官僚種族混合的制度。伯顏有復古的傾向，欲恢復世祖時代的舊觀，他也是一個蒙古本位主義很濃厚的人。

伯顏廢除科舉，不但漢人一致反對，連部分蒙古人、色目人也起而攻之，因爲許多吏進之士都以參與儒化運動爲榮，並將希望寄託於科舉，而且事實上，科舉對他們也較有利。由於伯顏的措施，引起強烈的反對，其姪脫脫在其師吳直方的慫恿下，大義滅親，驅逐了伯顏。

第四章 「儒家政治的勝利」

脫脫的啓蒙老師吳直方是一個儒者，透過吳的關係，脫脫又與許多儒生結交，故脫脫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也當政後，所

用的人，不管是蒙古人、色目人，或是漢人、南人，多半是習儒者之業，或是儒學的贊助者。故脫脫之當政，可說是儒家政治的勝利。其表現在外者，則為經筵之重開，使得儒生更有機會接近皇帝。

在本章裏，作者將元末的儒生分成兩派：改革派和保守派。前者以脫脫為首，虞集、揭傒斯、歐陽玄諸人輔之；後者以別兒怯不花、鐵木兒塔識、朵兒只、賀惟一諸人為主。元末的政局即改革派與保守派更迭為政的局面。改革派注重當務之急，保守派偏重於地方政治的穩定。雙方都攻擊對方儒學的真實性。保守派認為脫脫的措施，帶有法家急功近利的思想，改革派則認為別兒怯不花黨於伯顏。

作者認為改革派多來自江西，江西正是王安石的老家。虞集、揭傒斯、歐陽玄等人皆來自江西，又與脫脫相友善，他們的建議，影響了脫脫政策之制定。如虞集建議在華北大力發展農業，使京師不再依賴海運糧食；揭傒斯建議以翰林院為儲備中書省臣之所，皆被脫脫採納。

第五章 「功利之追求」

此章敘述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脫脫重新掌政後的治績。這包括貨幣的改革、黃河的治理、紅巾賊的平定及開發首都附近土地，增加糧產等。由於治黃及平亂之功，使脫脫的權力達於極點。

作者在分析脫脫平亂成功之因時，特別讚揚他的設想週到，由中央軍指揮一切平亂行動，不使軍權落入地方官手中，而造成軍閥割據之局。

第六章 「元朝地方主義之興起」

作者首先分析脫脫被貶的原因。他認為脫脫之去職，意味著中央權力之衰落與地方主義的興起。因為脫脫尚以中央控制一切平亂行動，在安撫敵人背後，有武力為後盾。而脫脫以後的主政者，能力、人品均不及脫脫，只是一味拉攏張士誠、方國珍，

欲借重他們救平叛亂，但他們只是敷衍，並不盡力，元朝的安撫只是使他們的地位合法化而已。

由於脫脫之被貶，中央軍士氣低落，再加上叛軍流竄，戰事拖延甚久，朝廷不得不倚重察罕帖木兒（其子擴廓帖木兒），及孛羅帖木兒等人，漸肇軍閥割據之端。

尾聲「元廷在中國之末日」

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年）後，元朝政治落在中書省和御史台兩個同屬保守，但勢不兩立的集團手中。他們也與外面的軍閥勾結，並參與宮廷王位之爭。中書省支持太子愛猷識理答臘及擴廓帖木兒，後者支持順帝及孛羅帖木兒。由於軍閥間的互鬥，削弱了元廷自身力量，不能聯合一致對付敵人，使朱元璋順利地推翻了元朝。

作者在結論裏，除了扼要敘述前面的內容外，並提出了許多概念，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討。茲分述如下：

1. 元末的政治史自一三二八年起。從此以後，元朝的歷史變成了中國傳統式的歷史，元朝皇帝不再是蒙古帝國的大汗。元朝的問題只是中國國內的問題，而中國傳統的問題，也在元朝發生，如君臣勢力的消長、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對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劃分等。這些問題，元廷都無法解決。

2. 一三二八年後君權的衰落——一三二八年的政變，將世祖以來斂財黨的殘餘勢力完全從政壇上掃除掉，並將儒學提高到支配性的地位。但儒學的勝利，並非皇帝一人的功勞，而泰半以政變首腦人物的功勞居多，故君權漸漸衰落，自一三二八年後，元朝皇帝再也無法控制官僚階級。順帝即位，伯顏和文宗后卜答失里專政，置順帝於無為之地。一三四〇年伯顏倒台後，改革派與保守派更迭為政，展開鬥爭，順帝担任的角色只是發布詔令，承認政權的合法而已，其在整個儒化運動中，功勞不大，故君權浸假以衰。順帝晚年不問國政，軍閥興起，君權更形低落。

3. 儒化運動，並非種族同化運動。儒化（Confucianization）與漢化（Sinicization）意義不同，前者指採取儒家之政治倫理學說，後者指種族、語言界線的喪失，征服者特權的喪失等。儒化運動的力量，不僅因它有超越各種族、團結各官僚的作用，也因為它是君主與高級臣僚接觸之橋樑。由於儒家學說是超越種族的，故終能成為元朝最高的政治理念。

4. 元末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分別——改革派組織比較嚴密，較具「黨」性，主張中央集權；保守派組織較鬆懈，只具「群」性，主張有限度的地方分權。保守派批評改革派的作法，易使地方政府無能，造成地方的叛亂，而實際上保守派的措施，也未能達到穩定地方的目的。

5. 元末御史台的跋扈，迫脫脫去職，造成了地方上叛亂的遽起。此外，御史台對於軍閥的興起亦應任其咎，因為御史們覺察到只有軍閥才能救平叛亂；故即使他們戰敗，亦不加以攻擊，却只攻擊那些無能的中央官，使得元末中央政府一直陷於癱瘓狀態。

三、總 評

作者以一三二八年為世界性的蒙古帝國演為中國傳統式王朝的關鍵，固為確論，但以此來解釋武宗（一三〇七—一三一）的成功與明宗的失敗，則殊為牽強。因為武宗能從漠北回就大位，並非因當時元帝國之重心在漠北，實因其第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之禮讓，故武宗即位不久，馬上以他為皇太子。一三二八年，和世球（明宗）從漠北趕回大都即位，不久暴崩，此實為骨肉相殘之慘劇，與帝國重心不在漠北無關。

作者認為元末改革派儒家承襲了王安石的精魂；保守派則承襲司馬光的遺風。作者以地域之關係來說明改革派與王安石之關連，而未將他們之間的師友關係說出，實難令人心服。此外，保守派又是如何承襲司馬光的遺風呢？能否從地域及師友關係中看出呢？作者一語未及。他對於改革派與保守派政治理念之分歧，亦未作詳細的討論。作者偏重蒙古、色目主政者政績的描寫，對於他們（伯顏除外）思想的剖析，仍嫌不足。他側重於蒙古人、色目人，亦有偏頗之弊。

達氏此書是以儒化運動的發展為經，以當時的主政者為緯，他僅對儒化運動的發展作一個時間上的劃分，對於儒化運動如何表現在社會各層面，却未作深入討論。漢人儒士的地位變化如何？元朝儒化的程度如何？均應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此外，還有一些小疵。例如伯顏的反儒，是否受到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的影響？因她在順帝初年以叔母的身分攬政，她篤信

佛教，是否因而排儒，她的態度是否影響了伯顏，均應再加以討論。脫脫在至正九年，重新當政後，所起用的人很少跟儒學有淵源，這跟至正元年他初次當政的作風完全不同，很可惜地，作者並非指明原因所在。

作者此書只分章，不分節，有時令人摸不著頭緒，而且第六章似可與尾語合併成一章。

作者全書偏重史實的敘述、分析，較少學理的探討，而且其討論的範圍過大，牽涉的問題太多，以薄薄的一本書來說，難免有捉襟見肘、顧此失彼之感，不過作者能從紛亂的史事中，抽繹出許多概念，讓我們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其筆路藍縷之功，仍是不可沒的。許多議論也都是發前人所未言。至於作者搜求史料之豐富，小註之詳細，蒙古官名的考譯，亦為優點所在。